胡克慎——从汝州走出来的抗日英雄

胡克慎(又名时英、胡治亚、胡然),汝州市(原临汝县)王寨乡胡庄村人,是较早从汝州市走出来的革命前辈之一。

胡克慎191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由于其母亲出身贫寒又是续弦,家庭地位低下,从小受到歧视和排挤,使得他萌生了反抗和斗争的意识。1932年,他15岁时考入临汝县私立汝阳初级中学,毕业后回乡担任了一年本村小学教员。1935年考入了位于河南省会开封的嵩阳高中。在校学习期间,他受先进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其他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张贴爱国抗日标语,散发革命传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拉开了序幕。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成了广大爱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胡克慎和汝州籍的王力民、武建业、马云涛四位高中同学,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相约到西北投奔革命。他们原打算到山西临汾去上民族革命大学。但他们到学校一看,发现民族革命大学是由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任校长,而不是由共产党主办的大学,于是就失望返回了汝州老家。虽然这次学没上成,但在返回的路上,他们见到了戴袖章的真正八路军,结识了傅西魁、徐子荣等共产党员。

从西北回来以后,胡克慎参加了由地下共产党员雷明(原为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秘书,后以洛阳《行都日报》记者身份被派往汝州开展地下工作)、杨福堂(河北省定县人,曾任临汝师管区中校科长等职,1939年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韩润甫等在汝州城举办的“现行军官训练班”。在那里结识了以士兵名义参加训练的地下共产党员王象乾。经王象乾介绍,他又结识了共产党员雷明。1938年,胡克慎利用其哥哥胡克勤为民团团总的特殊关系,掩护地下共产党员杨福堂全家安全转移。同年6月,经县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雷明同志介绍,他与王力民(又名王华宇,汝南街道办事处怯庄村人。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5年任国家七机部第二研究院政委,1968年5月在“文革”被迫害致死。197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刘波涛(汝州市蟒川镇娘庙村人)、马云涛(汝州市米庙镇人,1981年6月起任国家七机部政治部主任、航天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和范景明(汝州市风穴办事处吴洼村谭庄人。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等职)等6位进步青年串联相约,毅然离家赴西安投奔革命。由于在西安被特务跟踪,人员失散。几经辗转,终于在西安新华区七贤庄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与刘波涛两人先行,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徒步跋山涉水,在倾盆大雨没膝深的黄土高原泥泞中,连走带爬九百多里到达陕北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7月,胡克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六大队二队(军事队)学习。因他学习勤奋,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学习标兵,同年12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修建住房、挖窑洞,特别是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身患肺结核病,吐血不止,但仍超额完成每天开荒2亩的任务,还主动帮助记账、送饭等,被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授予“劳动英雄”称号。

1939年春,在抗大校址从瓦窑堡迁往敌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3000里“小长征”中,他不顾组织上让病号留下来的劝阻,拖着带病之躯,三番五次地坚决要求随校前进。因胡克慎同志健康问题,组织上就派刘波涛照顾他,并让他们成立一个收容队,收容病号和走不动的战士。他们每天都急行军120到140里,有时还得在路上和敌人打仗,经常吃不饱饭,有时甚至几天吃不上一点东西。有时就用茶缸装上小米,在老百姓的火上熬熬充饥。就这样,他们从延安一直走到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河北省阜城县。因胡克慎同志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沿途主动购买军粮并做民运工作,被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胡克慎同志抗大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抗战最前线、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经组织批准,派他到冀中十分区地委工作,先后任地委秘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敌人碉堡据点林立的平、津、保三角地区,他不分昼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两年多。1941年,在敌人的“铜墙铁壁拉大网”行动中,胡克慎被敌人围住,由于不是本地口音,他急中生智装作哑巴,背部被敌人的皮鞭抽打得鲜血直流,他咬紧牙关始终不吐半个字。新城县的一位老百姓深受感动,主动站出来指认说:“这是我家做活的哑巴”,这才算被掩护了下来,逃过了敌人的魔掌。

1942年,党组织派胡克慎到平北军分区滦昌怀联合县工委任宣传部长兼县游击大队政委。平北地区是一个伪华北、伪蒙疆、伪满洲三方敌人轮流扫荡的中心地区,环境极其险恶,大部分的山林、房屋均被敌人烧毁,制造了“百里无人区”。在县委书记牺牲、县长及大部分地下党员转移、工作环境异常恶化残酷的情况下,胡克慎带领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前赴后继,出生入死,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改编土匪周德全的部下。周德全后来担任县大队队长,胡克慎任政委。

1942年7月20日,胡克慎和两名警卫员,在滦、昌、怀联合县13区大片村开展工作时,被大部敌人包围,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敌人把他押解到黄花城后又转到了四海及永宁监狱。在狱中,敌人先后对他进行了多达七次的审问,日本鬼子采用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五花大绑假枪毙、蹲四周带有利刺的铁笼子等卑鄙手段进行严刑逼供,用金钱、酒肉、美女等对他进行拉拢腐蚀。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受尽了敌人的折磨。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每到一处,仍然不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骂日伪汉奸并做敌伪下层人员的工作。1942年11月29日夜里11点左右,他与刘旺成、刘存等地下党人趁敌人换岗的间隙,组织难友越狱,用偷来的井绳和大棒跳城墙逃出敌人的魔爪,重新回到平北党委机关。胡克慎在当地颇有名气,他不怕牺牲、顽强抗日的英雄事迹深受当地百姓的称颂并广为流传。

1943年,胡克慎同志奉平北党委之命,率领北平地区一批大、中专爱国学生安全到达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又派他到晋察冀边区整风班学习。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未毕业即被派往刚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敌伪物资处理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

由于胡克慎同志曾被敌人逮捕,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过整风班学习和组织审查,1946年2月经党组织批准,胡克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政治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三处、二十三兵团37军政治部工作。1949年1月初,胡克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方代表,抱着必死的决心,告别亲爱的家人,深入虎穴,到绥远河套地区接管国民党傅作义的通讯团。通讯团被改编以后,在胡克慎的领导下,确保了我军通讯畅通,为平津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1951年12月,胡克慎受命赴朝作战,担任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17师政治部负责人兼前线指挥所党委书记,参加了著名的反绞杀战役。在一次视察前线途中,遭到敌机的俯冲、扫射、轰炸,险些牺牲在朝鲜战场。

1952年9月,从朝鲜回国后,胡克慎在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中央军委空军六分部工作,并作为我方代表,接收苏联空军在大连的空军修理厂。1955年,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经中央军委空军党委反复调查、审查后,于1957年1月5日,对胡克慎同志的党籍问题作出最终结论,恢复他1938年12月入党的党籍。1958年,他由空军部队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任政治部副主任、所领导小组成员。“文革”中又因被捕的历史问题遭到审查、关押、“蹲牛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党仍忠心耿耿,无怨无悔。直到1978年1月,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胡克慎同志才被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1982年12月18日,胡克慎同志从正厅级干部的岗位光荣离休。

自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到因病去世,胡克慎同志念念不忘故乡汝州。因战事紧张、工作繁忙等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如愿。直到1991年才踏上了阔别51载的故土,受到汝州市四大班子领导的盛情接待和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97年2月他慷慨解囊,为汝州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爱我中华、爱我故乡奖励基金”捐助资金,奉献了爱心,贡献了力量。

2005年4月8日,88岁的胡克慎同志在北京同仁医院逝世,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胡克慎同志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和刘波涛同志都是从汝州走出来的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既是同乡,又是生死战友。在战火纷飞,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们肝胆相照,不离不弃。在抗大大转移、行军过程中,刘波涛同志冒着枪林弹雨,背负、照顾有病在身的胡克慎同志,宁可自己吃野菜,把仅有的小米留下让胡克慎同志吃。后因工作需要,他们各奔东西。刘波涛同志1945年曾任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副县长。1947年2月任中共沈(丘)鹿(邑)淮(阳)县委书记,其爱人丁琪任郭城区政委。同年3月,夫妻双方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战斗中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胡克慎经多年找寻,终于找到了刘波涛烈士沿街讨饭的残疾遗孤李万年。在胡克慎同志的不懈努力下,经河南省委组织部批准,在刘波涛同志牺牲地郭城县人民医院安排了工作。

胡克慎同志还是一个大孝子,从建国初期他就把出身贫寒的老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孝敬,悉心照料,直到104岁颐养天年。

胡克慎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政治立场坚定,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大义凛然;严于律己,为政清廉,工作深入,作风扎实,为人正直,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无论身处何境,革命征途上如何艰难险阻,他都始终如一、无怨无悔,总是团结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文根据胡克慎的爱人国炜及长子胡时虹提供的资料,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整理而成)

洗耳河南段垂柳依依

宋小亚　摄

何首乌的故事

民间故事

风穴寺的东山上,有一片竹林,里边长满了何首乌,据说,人如果喝了从那片竹林里流出来的泉水,年纪大的人能返老还童,白头发的人能使白头发变黑,没头发的人能长出头发来,这里边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呢!

从前,风穴寺附近有一个穷孩子,成天为一家大户割草喂马,挣几个钱养活他有病的娘。有一年,这孩子每天都要割好大一捆草,天天都是这样儿,到了冬天,地里的草都死光了,可是这孩子仍然每天背回一捆草,那草还又嫩又青,这事让那家大户的掌柜感到奇怪,心想:天寒地冻,这孩子是从哪儿割回的草呢?就暗地里跟着那孩子,想弄个究竟。那孩子每天都进了风穴寺东山那片竹林,跟进去就不见了。掌柜的越来越奇怪了,有一天,就问那孩子:“你是从哪割的草?”那孩子说:“俺是在竹林里割的草。”掌柜的说:“你说瞎话哩,我每次跟你到竹林里,咋都不见你了,快说实话,不然我就不要你的草了。”那孩子急了,说:“真的,我都在竹林里割的草,不信我跟你一起去找找地方。”

掌柜的就跟那孩子进了竹林。可是那孩子进了竹林,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地方,掌柜的吓他说:“肯定你说了瞎话,要不成天割草的地方咋找不到呢?快说实话吧!”那孩子这才说道:“俺每天一进这竹林,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头非要拉着俺下棋不可,我说我不下,我得割草卖钱,养活俺有病的老娘。那白胡子老头说:你只管和我下棋,下完棋自然给你一捆草。”掌柜的一听更奇怪了,说:“在啥地方下棋哩?”那孩子说:“反正他下棋的地方有棵大树,树下有块大青石。”可是竹林里根本没有大树,也没有大青石。

掌柜的心想遇到怪事了,他不动声色地对割草孩子说:“你明天还来割草吧,可不能说我来找过的事。”

第二天,割草孩子临走的时候,掌柜的偷偷在他衣裳上缝了一根线,顺着线跟割草孩子进了竹林。割草孩子进了竹林,又碰见了那个白胡子老头。那老头说:“咱俩今儿还下棋吧!”割草孩子说:“中!”两人就坐在大树下摆开了棚子。刚下一盘棋,那白胡子老头突然左右一瞅。呼哧呼哧鼻子,说:“一股生人味!你引谁来了?”割草孩子说:“没有呀!”白胡子老头把棋一推,说:“今儿个就玩到这儿吧,我走了。”说完,身子一晃,就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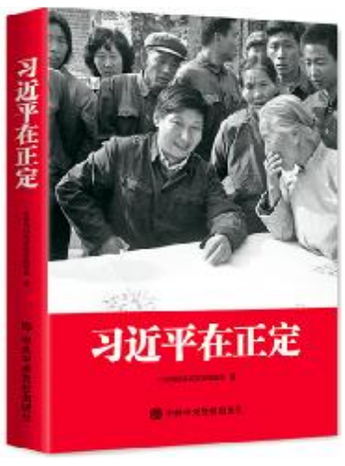
割草孩子很害怕,扭头一看,见掌柜的带着三个长工,到了他跟前。掌柜的问:“白胡子老头哩?”割草孩子说:“走啦!”掌柜的吩咐三个长工说:“回家拿家伙,在这儿朝下挖!”

三个长工回家拿来了镢头和锨,在那个下棋的地方朝下挖,整整挖了半天,挖到一丈多深时,挖出一个大何首乌,那何首乌胳膊那么粗,三尺多长,粗看起来,还真像一个老头。

原来,割草孩子遇见的那个白胡子老头是个长成精怪的何首乌。不过,风穴寺东山上的何首乌并没有从此绝迹,直到今天,那片竹林里还长满了何首乌。

讲述人:**常法定**
整理人:**常文理**

·连载·



正定原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叫宋联捷,就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地方武装。习书记经常到家里去看望他,对他说:“你有啥事,就尽管跟我说。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咱们有一辆吉普车,优先给你用。”宋联捷当时已经70多岁了,家住得比较远,习书记就把他的家搬到县委门口的马路南边,方便县委的同志们照顾他。宋联捷一直非常感激习书记,对习书记评价很高。他说:“像习近平这样,革命的好后生,人民的好干部,难找!”

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宋联捷有一次生病,住在石家庄第四医院。我们县委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他都说:“每次你们一来,我就回想起习书记对我的照顾,我真感谢习书记,真想习书记啊!”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正定的各项工作全面进步,达到了1947年解放以来的最高峰。全县老百姓对习书记的工作成绩非常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写的《正定古今》这本书,您也参与了吗?他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编写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五普:这本书编写之初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期参与的。

关于正定的历史书籍,习书记都认真地读。他经常说,正定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发扬光大。1984年3月,习书记提议我们编一本涵盖正定古代、近代、现代各阶段历史的普及读物。他提议,编这本书,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有个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定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认真地加以总结,对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很有好处。第二,正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名人,也有很多历史文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对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让读者有很多收获。

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以后,同意从办公室抽调几个人来做这个事。书稿完成以后,反复进行了几次修改,习书记都参与了,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见,并且邀请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给这本书提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

习书记用了很大精力组织编写这本书,编得很细致、很全面,一直到他离开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时候,这本书还没编完。到了1987年,我又组织人再次进行修改,之后把书稿寄到厦门去,他又对书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改完之后,他给这本书写了个序。到了1987年5月,他改完的书稿送回正定,我们按照这个最终稿正式出版。

读了习书记为这本书写的序,我感触非常深,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在序中,他第一句话就写道“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见诸文字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写道:“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正定古今》的出版,使我如愿以偿。”他的话说得很动情、很真切,只有对正定、对正定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他心目中,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民,他们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他对正定人民的深情比海还深。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感受到习书记的心在为正定激动,他对正定寄予殷切期望。他写道:“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正定古今》的书名也是习书记定的。我们当时有三个备选书名让他选择,一个是“正定古今”,一个是“三国雄镇”,还有一个是“北方重镇”,他选择了第一个,这个名字也确实是最朴实、最合适的,让人一看就懂。我找到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绮,请他题写书名。黄绮曾是习书记聘请的顾问。他一听,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既然是习书记交代的事,我赶紧写!”

(未完待续)